

中国高端讲座

本系列书所收录的作品，均来自在历史文化领域中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专家的讲座，代表相关领域一流的学术水准，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每一篇讲稿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作者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几易讲稿，力求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

刘梦溪 等著

海南出版社

第壹辑 文化的要义

中国高端讲座

第①辑 文化的要义

刘梦溪 等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端讲座. 第1辑 / 刘梦溪等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43-1879-6

I. 中... II. 刘... III. 文化史—世界—文集
IV. K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948 号

中国高端讲座. 第1辑

作 者: 刘梦溪等

策 划: 杨力虹 张明

责任编辑: 杨力虹

特邀编辑: 文欢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0千

书 号: ISBN 7-5443-1879-6/C · 48

定 价: 2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出版说明



本系列书所收录的作品，均来自在历史文化领域中建树卓著的著名学者、专家的讲座，代表相关领域一流的学术水准，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每一篇讲稿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几易讲稿，力求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

收录的文章包括：①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就有关中国和世界历史、传统文化等专题向中央有关领导进行讲述的部分讲稿；②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讨论部分讲稿；③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的有影响的历史文化讲座的部分讲稿；④大型电视历史文化讲座中的部分讲稿。

本系列丛书的出版得到国内相关领域著名学者、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并对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卓越创见表示崇高的敬意。

编者

2006年12月5日

C
O
目
录
U
+
S

出版说明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 刘梦溪 I

儒学与人生

◎ 钱 逊 33

中国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

◎ 金开诚 49

道教与 21 世纪

◎ 葛荣晋 67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反思与展望

◎ 叶廷芳 90

说“无”谈“玄”

◎ 庞 朴 III

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研究

马大正 128

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

◎ 陈漱渝 148

《周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张立文 164

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

◎ 张海鹏 189

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 刘梦溪

● 刘梦溪 1941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艺学和艺术学两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等。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时间阶段，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100年。具体时间应该是1895年前后至20世纪末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100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时间阶段，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100年。具体时间应该是1895年前后至20世纪末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100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

首先在理念上，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晚周——东周时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百家争鸣”时期，孔、孟、荀、韩、墨、老、庄等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期。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晚明——明清鼎革，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历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千年以上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晚清——对中国的历史演进来说，就更重要了。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

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其次在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晚清时期的开明的官吏、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已经直觉地感悟到了这种社会与历史的变化，他们称这种变化为历史的大变局。下面试举几例，看看晚清的一些政治敏锐人士是怎样看待这种历史的大变局的。

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徐继畲(福建巡抚)说：“南洋诸岛国……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王韬(著《弢园尺牘》、学人)说：“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创局也。”又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丁日昌(苏州布政使)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曾纪泽(出使英法大使)则说：“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郭嵩焘(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使)也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

世铎(礼亲王)：“窃思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亦天下臣民所共愤。”

薛福成(《庸盦全集》作者、学人)：“近数十年来，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寰诸国互为比邻，实开宇宙之奇局。”

郑观应(著名实业家)：“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有之也。”

张自牧(驻英国二等参赞):“今夫数千年来未经见之事,数万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盘踞于腹心之地,往来于堂闼之间,此古今运会一大变局也。”

(上述诸人关于“大变局”之言论,请参见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6~39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初版)

我们从上述言论可知,当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敏感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晚清社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入,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入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做“西潮”。但汉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与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都阻挡不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是融佛入儒的结果,所以产生理学。然后是佛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佛教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即天主教,一般以明朝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出去；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英法联军且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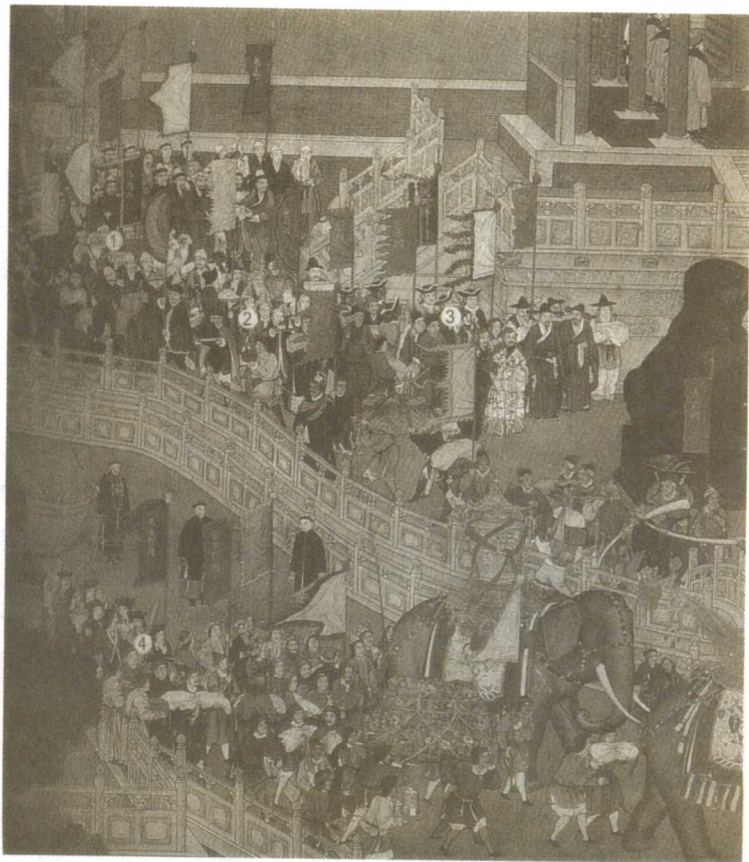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二）“夷务”和“洋务”

当“西人”列队扬威前来叫阵的时候，中国一方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开始的态度是要“御夷”，

：：《万国来朝图》
中各西洋国使者

西洋各国使者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俄罗斯等。这些国家使者及其服饰风俗，也有记载在《皇清职贡图》上，互相参看可以了解清朝对外国的认识程度。



也有的官员声称应“剿夷”，结果行不通，于是便想出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方法，但都没有多少效果。不过朝野上下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夷务”因此变成了“洋务”。其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清廷开始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在此前，处理外事没有专门机构，一般都由“理藩院”处理。

奕訢、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觅制器之器”就是李鸿章开办洋务之始提出来的主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最早的制造机械、枪炮的工厂江南制造局，也为李鸿章一手所经办。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三)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8月打起，7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几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难辞其咎，翁同龢、李鸿藻、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实际上也有误国之责。我们看当时的史料记载，翁同龢等为“摧折”李鸿章，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于李鸿章的，亦不乏明智之士从另一角度责难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

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剖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第21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所以，10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定《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100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

遗留问题，是我们的内政，这样说并不错。但日本侵略者占领、统治台湾50年，同样是今天形成所谓台湾问题的一个历史因由。李登辉们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

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第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作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30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提出：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四)戊戌变法和慈禧政变

甲午战争的另一结果，是激起了全社会的改革浪潮。自1840年以来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侵袭，已不堪忍受。现在又败在了东方的“蕞尔小国”——日本的手下，这个国家还有脸面在世界上立足吗？而日本之所以变得强大，是由于经过了明治维新、走上“脱亚入欧”的历程。中国只有变革维新一条路了。

所以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全国一致的呼声是改革、变法、维新、自强。光是购买洋枪洋炮不行了，还要变革制度。光是指望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不够了，还需要借助社会舆论。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就在这一年。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强学会”也成立于这一年。1896年，改革派的喉舌《时务报》在上海创刊。1897年，《国闻报》亦创刊。湖南则有《湘报》《湘学报》。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总之从1895年秋天到1898年秋天，全国到处都刮起了改革之风。湖南在巡抚陈宝箴和其子陈三立的带领下走在改革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皮锡瑞、唐才常等改革派人士，一时齐集湘省，而尤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最具影响力。

1898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发表《定国是诏》，开始了近代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成了变法维新的主角。严复翻译《天演论》也在这一年。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发的改革谕令有180多条，七月二十七日一天就颁布11条维

新谕旨，包括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但这一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通缉康、梁，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百日维新”所以也叫“戊戌变法”，慈禧政变称做“戊戌政变”。

变法改革有渐进和激进的区别，变法过程中一直有两种思想的争论。例如张之洞、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就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康、梁、谭嗣同等则主张用激进的方式。戊戌政变的发生，实是激进变革所致。晚清本有帝党、后党，清流、浊流之分，激进变革的结果，诱发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矛盾，致使中国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变法，以失败并且流血而告终。但戊戌变法是近代历史的一个大事件，不是几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戊戌变法之后的历史事变就更有戏剧性了——

1899年，慈禧大规模清剿“康党”、想废掉光绪未果。义和团开始起事，与“西人”矛盾激化。包括日本在内的“外人”，都反对慈禧的政变，他们袒护流亡到海外的“康党”，这样一来越发激起慈禧对“洋人”的仇恨心理。

1900年，慈禧改变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灭变成利用，直至向西方诸国宣战，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演出近代史上又一次洋人占领中国都城的悲剧。

1901年，清廷与十一国公使团“议和大纲”签定，是为《辛丑条约》。李鸿章在这一年病死。

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底，两宫还京。慈禧出逃时，身无长物，回来时装载箱笼的车辆有3000之多。因李鸿章的推荐，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4年2月9日，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打起，至第二年秋天方结束，结果日本占领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同年，为庆祝慈禧太后70寿辰，清廷赦免戊戌在案人员，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部赦免。

1905年，废除科举。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这一年成立。

1908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光绪死，二十二日慈禧死。光绪38岁，慈禧73岁。光绪之死，是晚清史事的一个未解之谜。

戊戌变法之后，1901~1911这10年，清朝的权力中枢做了什么？过去讲这段历史，戊戌变法之后接着就讲辛亥革命，对

中间的10年研究得不够。其实1902年慈禧回銮以后,除了继续惩治维新党人,同时也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变法维新举动,特点是变革机构、不变革思想。再就是所谓“准备立宪”的活动。晚年生活在台湾的近代史学者郭廷以教授,把这一时期的改革叫做“反动后的新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逊位,享受优待条款“仍住故宫、待遇不变”。同时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2月15日,袁世凯任“新举临时大总统”。延续3000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以及清末民初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晚清到民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大体轮廓稍作梳理,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在晚清社会所遭遇的危机

(一)“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我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前,需要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稍作区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时不宜混为一谈。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做传统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形态逐渐凸显。当然无法用1911年把传统与现代作一截然划分,文化与社会变迁比政治事变要复杂得多。宽泛一点看这个问题,也许讲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语义和事实上比较恰当。总之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化可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

人类学家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们20世纪50年代

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我个人使用的定义，是自己在研究中尝试着抽绎出来的看法。

我倾向认为，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些什么特质呢？

1. 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自夏、商、周三代的夏朝算起，有4000多年，所以号称5000年的历史文明。从周秦算起，有3000多年。世界有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古文明之一。

2.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形态框架内生存的文化系统。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秦汉到晚清都是封建制度的社会，说传统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较少变化，应该能够成立。但这不妨碍不同历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如殷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秦汉的制度文化、唐的多元繁荣的文化、宋的思想、明代的城市生活、清的学术等。就文化的形上形态的学术思想而言，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高峰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

3.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多元文化形态。就其发生来说，是多元的。过去说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现在学术界的看法，长江文化是与黄河文化不同的一源。就其族群的构成来说，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同时包括众多民族的文化。就文化思想来说，儒、释、道三家主要思想学说，呈多元互补之势。

4. 中国文化是富有包容性的文化，它的同化的功能很强。孔子说：“夷狄之人中国，则中国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